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0039



试论建党时期思想理论建设
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熊崇善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1991年7月

论 文 提 要

一、建党时期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内容。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着重从四个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注重传播唯物史观，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二）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确立党的宗旨和纲领；（三）全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确立党的革命路线；（四）系统介绍列宁的建党学说，确立建党的原则。这说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四个坚持”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基石，是建党时期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命题，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首先概括提出的，是对我党自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党的光辉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生活都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党立国之本，是象航海中的指针一样，时刻也不能偏离的。

二、建党时期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特点，也是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在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紧密联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三）重视向无产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解放道路和历史使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三条历史经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光辉历程。建党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①。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党的历史，吸取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现阶段党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想就这个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建党时期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内容

我们党在创建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艰苦进行的。他们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和建党的需要，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注重传播唯物史观，确立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从它建立以来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是唯物史观，并以这个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把唯物史观看作建党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先介绍了有关唯物史观原著的脉络，说明“唯物史观的要领”，阐述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和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认为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②，并反驳了对于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对中国人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李达是我国早期较为完整、准确地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者，他在建党时期的一些论著译作都以“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为主要内容^③。蔡和森和毛泽东首先鲜明地提出把唯物史观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蔡和森致毛泽东的信中认为：“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④并强调指出：必须“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只有分清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才不至堕入迷阵”^⑤。毛泽东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⑥。

通观他们在建党时期的论著，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做了相当准确的介绍。首先阐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革命的根源存在于经济的领域。李大钊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⑦。李达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还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崩溃为例来说明社会发展的根源问题。他认为“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的独占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生产机关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遂与资本主义不能两立，而新社会组织于是起来代替了。”^⑧

他们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说明了社会革命的根源存在于经济领域，批判了唯心史观以人的思想、精神来解释社会革命的各种谬论。李大钊认为，全体人民“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是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变化的“最后的

原因”^⑨。他明确指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展”是“唯心的解释”，认为“历史的唯物的解释”是“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⑩李达也明确指出：“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⑪

他们在阐述社会变革的根源在于经济领域的时候，也十分重视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社会变革中的物质条件和人的因素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说明，既反对唯意志论，又反对机械论，注意贯彻唯物的一元史观，防止引向二元论和折衷主义。李大钊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天由命）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⑫李达认为把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绝对对立起来的机械史观的必然结论，就是否认革命。他指出：“若说资本制度的解体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则由旧社会推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志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成机械的史观了。若是这样解释，社会党无须干社会革命，只听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了。”^⑬他还深刻指出：“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社会中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⑭陈独秀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人们依据社会经济法则，可以学得到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⑮。

他们还着重地宣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李大钊满怀激情地歌颂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他批判了唯心史观把历史看成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少数英雄的业绩，指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如此，现在已是我们的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⑯。他说：“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号召“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⑰。但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人民才能得到自由和解放。为此，毛泽东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著名论文，指出只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方法”。李达在《劳工神圣颂》一文中宣告：“单单一个人是神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劳工神圣的时代了”^⑱。热情赞颂“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的伟大历史作用^⑲，指出剥夺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劳动者应肩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由于有上述唯物史观思想的传播，我们党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既要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根源上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括阶级斗争的规律，又要充分认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既要尊重客观的物质条件，又要尽量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二）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确立党的宗旨和纲领

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是两篇有代表性的论著。他们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紧密结合，从理论本身的内在联系上说明了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科学社会主义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终结。李大钊指出：离开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再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②李达把“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理想中的社会”概括为七条，系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③这样的概括，在当时非常需要，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因为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所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运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虽然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还不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闭关锁国的状况一旦打破，社会主义新思潮也就蜂拥而至，中国的思想界也就立即活跃起来，介绍各种新思潮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个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当时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学说，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打着“新思潮”的旗号获得了进一步散播的机会，广大要求革命的群众一时还难以分辨，莫衷一是。理论是为实际斗争服务的，实际斗争向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用唯物史观来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正是适应这种革命形势的要求，把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他们在研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着重回答的是以下一些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些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建党的宗旨和纲领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回答“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明确地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④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是两篇系统论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具有很大影响的著作。李达在批判研究系的资产阶级政客梁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等谬论时，明确地肯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他说：“至于说中国现实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这是我们的承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他还对比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论证了世界

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并且信心满怀地指出：中国“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①。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肯定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②；毛泽东复信表示“深切的赞同”。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明确地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支那”，“共产党的目的，乃在于实现共产主义”^③。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对于我们党明确宗旨，制定纲领，坚持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全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确立党的革命路线

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型国家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我们的时代，尚未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特别着重研究和系统阐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直接关系到党的纲领、路线和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他们在当时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首先要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对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在此期间，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直到“私有制完全废止，失了复活的可能”、阶级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渐就消泯”^④。李达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⑤蔡和森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⑦毛泽东复信同意他的意见，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⑧。

他们还明确断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李达说：“要推翻资本主义，必须厉行阶级争斗”^⑨，必须“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⑩。蔡和森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⑪，应“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⑫。毛泽东复信时赞同“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⑬。陈独秀也表示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劳动阶级要“经过阶级战争”去“占领权力的阶级地位”^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本质、作用和形式，李达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论著中作了相当系统、相当准确的阐述。他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指出“劳动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

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劳动者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劳动阶级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产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一方面用强制的权力，破坏资产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机关，从资产阶级夺取武装，把劳动阶级武装起来，制服一切反革命的反动力，因此徐徐的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③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是“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产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最终达到“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的共产主义社会^④。蔡和森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⑤陈独秀也表示过相同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⑥。

正是由于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入研究和传播，使我党得以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取得今天的伟大胜利。

（四）系统介绍列宁的建党学说，确立建党的原则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原则建立起一个革命的政党。为此，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以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路线，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他们首先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达认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他指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⑦。他响亮地宣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因此，他强调指出：党应该是工人阶级中“少数有革命精神的”、“少数有阶级觉悟的人”组织的“一个精密的团体”，“从事组织、训练”多数工人，党员应该“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⑧。蔡和森对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有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⑨。他强调要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⑩，强调党员的入党条件。认为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⑪，对“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⑫，以便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他们还宣传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原则，说明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以取全体一致作革命的运动，行统一的计划”^⑬。还宣传了党员必须服从组织，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党内的选举和讨论，“意见虽不能划一，但既经多数取决，少数也应该服从”^⑭。他们当时特别强

调的是集中，纪律和有服从，认为“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④。

上述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概况，充分说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四个坚持”是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基石，是建党时期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中国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正是由于贯彻实行“四个坚持”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1973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命题，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概括提出来的，是对我党自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⑥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也才能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应象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那样费尽革命思想家的心血来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总之，党的光辉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生活都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党立国之本，是象航海中的指针一样，时刻也不能偏离的。只有这样来认识问题，我们才能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建党时期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特点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建党时期从事思想理论建设工作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在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党在创建时期的理论建设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严重的思想斗争中进行的。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第三次是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他们在各次论战中都取得了胜利，同时还批判和抵制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袭，扫除了横梗在建党道路上的障碍，为我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说刚刚传入中国时，就遭到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抵抗，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奋起反击，展开了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大论战。斗争围绕中国革命是否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否要用革命手段实行“根本解决”为前提等重大问题而展开，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通过这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确定我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当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把建党的任务提上日程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就

更加严重了。党在上海发起组刚刚建立，就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围攻：一方面来自反对革命的敌人，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的资产阶级政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攻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宣称中国“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无法均产”，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才有“凭借”。他们鼓吹“劳资协调主义”，反对社会革命。还胡说中国“无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兴起，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建立，妄图阻拦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另一方面，一些赞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声称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主张人类“互助和‘平等’”；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主张小生产者的分散生产和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和集中领导，主张绝对自由和极端个人主义。他们集中攻击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如果不在理论上扫除横梗在建党途中的这两大障碍，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党的上海发起组以《共产党》月刊和它的公开机关刊物《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反对“假社会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各地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战斗，粉碎了这两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围攻。这两次大论战的胜利，对于扫清建党的思想道路，奠定党的理论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假“社会主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上。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针对研究系的资产阶级政客所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他们根据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国情，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指出：世界已经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主义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⁵²”。李达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万国竞争”掠夺之下的中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他深入地分析说：“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糟糕到极点”的“空想”⁵³，“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⁵⁴。他们还揭露了“劳资协调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阐明于社会主义不能靠改良，只能靠革命。李达指出，劳动阶级要谋求解放，只能靠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他还深刻地指出，研究系的反动政客所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议会主义等，只“不过要求资本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⁵⁵。社会主义的敌人之所以实行社会政策，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企图“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⁵⁶。蔡和森针对梁启超之流的所谓“社会主义”尖锐指出，无论它装扮得多么巧妙，都是为了反动阶级思想服务的，尽管他们把其“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在资本家的翰林园里供它的御用罢了”⁵⁷。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公开宣传建党的必要，号召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国内的恶

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⑧。他们的这些论述,有助于人们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界限,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论争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要不要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他们首先抓住无政府主义的根本政治观点进行批判。李达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各分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其要害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针对无政府主义关于“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观点,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区别,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⑨。蔡和森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⑩陈独秀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攻击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劳农专政的政治制度的谬论时指出:在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不免。”^⑪其次,他们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观点。李达指出: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目的是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并不是生了产就完了的。所以由这种意味说起来,新社会的生产组织,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⑫。他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企图超越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等错误观点,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学说。明确指出:超越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⑬。他们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组织纪律的观点,论述了革命组织纪律的重要性。李达还深刻揭露了各派无政府主义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科学的体系和哲学的基础的”,“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⑭。他还十分注意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对“理论”是彻底批判,对人则尽量争取。他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要约同这些朋友们加入我们的队伍”^⑮。这次论战对于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促使许多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者,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清除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恶劣影响,纯洁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对于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史实表明,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进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这是我们党在创建时期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通过三次大论战,集中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是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二是中国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必须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十分注意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批判和抵制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袭。他们写了大量文章,介绍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斗争的历史,揭露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宣传列宁及其领导的第三国际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并使之发扬光

大的丰功伟绩，帮助人们划清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等文章中，揭露了第二国际“堕落的历史”，指出他们搞的是和资本家妥协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揭露了第二国际的首脑人物或入阁做官，或拥护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丑行，并谴责道：“他们讲什么社会主义呢？他们已经改变成讲国民自由主义的人了，他们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哪配代表各国的社会党呢！所以国际共产党就产生出来了”^⑥。文中还介绍了第三国际成立的经过，得出结论说：“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代表国际社会主义的权威，就是这个国际共产党。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呵！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呀！”^⑦李达在《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中，援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详细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说明“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⑧。他还深刻地揭露和剖析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指出他们“在哲学方面已由实证主义转入新理想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也不能超过这范围独立存在，所以新理想主义，渐至代替唯物史观的位置。同时修正派运动发生‘新马克思派的康德化，新康德派的马克思化’的现象，愈增显著了。于是柏伦斯坦因（即伯恩斯坦——引者）的修正主义，遂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员大多数的心理，都放弃革命主义流而为进化主义、改良主义。”^⑨李达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及其哲学基础的揭露和批判也是针对研究系的资产阶级政客梁启超、张东荪而发的，可谓一箭双雕。由于修正主义符合这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需要，因而他们就成了当时修正主义在中国的贩卖者。在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公开鼓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说什么“吾国人之所以当学者，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取议会政略”“对于列宁（即列宁——引者）式之革命，不敢苟同”^⑩。这个杂志还发表了许多攻击唯物史观，鼓吹“新理想主义”即“新康德主义”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叫嚷“去马克思而返于康德”。张东荪在《指导、竞争与运动》一文中攻击马克思主义过于偏重唯物主义的方面，反而“足以妨碍社会的改良”，不可不加修正，要“从唯物主义移到精神主义”，等等。因此，在批判研究系所鼓吹的“假社会主义”时，必须进一步批判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否则，要建立列宁主义的党是困难的。我们党一开始就没有沾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灰尘，固然和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以及我国的社会条件有关。同时也与我国共产主义先驱者在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目前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蜕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欧几个国家长期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是这些国家党内机会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机会主义思潮是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一脉相承的。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把国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应当把批判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抵制国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联系起来，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潮中加强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紧密联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从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特点

这是因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首先是革命家,然后才是理论家,因此他们不是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搞空洞抽象的理论宣传,而是为推进中国革命去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李大钊在反对胡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就明确指出:“宣传理想主义”和“研究实际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不应当截然地把它们分割开来^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和各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并且告诫人们,不要偏于“纸上空谈”,而应“暂向实际的方面去作”^②。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他从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之日起就特别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曾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③这一段话表明,毛泽东在重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同时,更重视研究中国的国情。他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世上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④他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认为单凭“个人冥想”以求改造社会,其结果“多有陷入错误”^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南,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李达也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认为“我们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际上去做”^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⑦。在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上,表明共产党“不独是言论家,并且是实行家”^⑧。共产党不以有好的理论为满足,而是“言论和实际并进”^⑨。

我们不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且朝着这个方向迈出最坚实的一步。这首先表现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合乎实际的科学论断。他们向中国人民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明确提出了反帝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他们首先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强调中国贫苦农民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李达说:“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⑩。《共产党》月刊发表的《告中国的农民》,对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讲得更加清楚,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假

若他们有了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十分的可能性了”⁸¹，等等。这些思想对于刚刚建立的党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它表明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问题，并且有了初步的良好开端。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建党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指明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我们今天应当继承和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必须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三）重视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唤起他们的阶级觉醒，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解放道路和历史使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从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又一显著特点。

他们撰写了许多劳动者为宣传对象的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劳动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以及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李达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向工人讲述了有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明确指出：劳动者要获得解放，“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⁸²，号召劳动者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的《告劳农兵》、《告劳动》等文章，都是通俗的语言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说明劳动者困苦根源，指出劳动者的困苦“决不是枝枝节节可以解决的”，“唯一根本方法”就是“用革命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⁸³，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国会，把资本家的私有制改为公有制。还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依赖“自己的劳动革命军”⁸⁴，号召无产阶级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要完成全人类的解放，要完成社会革命，必须无产阶级都起来做一个革命者。”⁸⁵

李大钊最早注意从事工人运动，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到群众中去宣传和组织群众。他强调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⁸⁶他在《‘五一’运动史》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斗争历史，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觉悟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并且寄希望于中国先进的知识界：把“三五文人”的“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为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和“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发起和主持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在长辛店等地建立了固定活动的场所。党的上海发起组和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更加强了工人运动和工人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他们创办了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和《机器工人》、北京的《劳动音》和长辛店的《工人周刊》、广东的《劳动声》以及山东的《济南劳动周刊》等。他们还兴办了工人夜校，如北京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小沙渡的“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广东的“机器工人夜校”以及武汉的“工人识字班”等。有的地区还组织调查组，深入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学习，宣传革命道

理，启发工人觉悟。总之，他们把向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进行社会革命的辅助手段，看作是促进劳动者觉醒和自觉参加革命斗争的有效办法。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明确指出：除直接行动这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敌忾心，亦能发生效力。”^③事实上，他们在建党时期开展的思想理论宣传教育活动是发生了这种效力的。当年，正是由于我国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加速了无产阶级从自发到自为阶级的转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保证了我们党的性质从开始建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由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系统地向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提高全体人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使他们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使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坚实可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我们的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到四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理论的准备是不足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有不够完整、不够精当之处。在联系实际方面，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等重大问题还缺乏具体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尽管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他们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是传播革命火种的先驱者。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建党时期所奠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的历史功绩，是永垂史册的！今天，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强国，我们必须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让我们沿着党的创始者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注：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②⑦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李人钊选集》第178、185-186、335、337、339、340、330、176-177、357、397-398、356、228、230、146、324页。

③《唯物史观解说》的《译者附言》。

④⑤⑥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蔡和森文集》第64、63、50、79、65、50、51、71、51、52、71、70、70、76、51页。

⑥⑩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15、6页。

⑧⑨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李达文集》第1卷，第35、47、35、36、43、45、30-31、63、31、37、72-73、102、103、31、133、134、66、65、72、69、74、50、51、90、78、34、36-37、56、203、138、41、56页。

⑮《陈独秀答蔡和森》，《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⑤⑦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共产党》月刊第5号，第11、12页；第1号，第30、47、14、15、49

页，第2号，第47页。

④⑤⑥《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④⑤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0-151、166页。

④⑤⑥参看《李达文集》第1卷中《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④⑤⑥《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页。

④⑤⑥《关于农村调查》，1978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④⑤⑥《毛泽东给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

④⑤⑥《毛泽东给陶毅的信》，《新民学会资料》第59-60页。

④⑤⑥④⑤《共产党》月刊，第3号，第3页，第5号，第3、22页。